

中國歷代思想家【九】

更新版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王德毅 蔡仁厚 封思毅

著

陳郁夫 董俊彥 陳弘治

范仲淹・孫復・胡瑗・邵雍
周敦頤・司馬光・張載

范仲淹·孫復·胡瑗·邵雍·周敦頤·司馬光
張載 / 王德毅等著. -- 更新版. -- 臺北市
：臺灣商務，1999 [民88]
面；公分. -- (中國歷代思想家：9)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575-9 (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傳記

120.99

88002831

中國歷代思想家(九)

范仲淹 孫復 胡瑗 邵雍 周敦頤 司馬光 張載

定價新臺幣二二〇元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著者 王德毅 蔡仁厚 封思毅
陳郁夫 董俊彥 陳弘治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陳寶鳳 許素華 江勝月

印刷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三三一六一一八
傳真：(〇二)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四月更新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575-9 (平裝)

42312020

范仲淹

王德毅 著



目次

一、傳略.....	0
二、思想.....	0
三、著作.....	1
參考書目.....	9
	2
	2

范仲淹

一、傳略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宋太宗端拱二年（西元九八九年）八月二日生於徐州，當時他父親范墉方爲武寧軍（徐州）節度掌書記。明年，父卒，母親謝氏，以家貧沒有依靠，改嫁給淄州長山朱氏，遂隨後父姓朱，名說。年二十一舉學究爲秀才，爲諫議大夫姜遵所禮遇，讚爲奇士，將來一定威名蓋世，遵的眼力果然不錯。

仲淹出身寒素，從小便養成勤儉的好習慣，中學究後，便到長白山醴泉寺的僧舍裏讀書。每天做一器粥，俟其凝固，分爲四塊，早晚各吃兩塊，只用十幾根薑菜切成碎末，和少許的鹽，作爲菜餚佐餐，如此者兩三年，學業的基礎奠定了。仲淹看到朱家兄弟浪費不節，常常加勸告，他們大爲不快，憤憤地說：「我們自用朱家的錢，關你什麼事？」仲淹聽了非常駭疑，乃向母親叩詢得悉家世，決心要靠自己樹立門戶，乃隻身往南京（應天府）人睢陽學

舍就讀。情況比以前還要貧乏，生活的刻苦，不是別人所能忍受的。他的《學舍書懷》詩就有「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消」，《范文正公集》卷三，完全道出安貧樂道的心境。他日以繼夜的苦讀了四五年，終於貫通了六經的要旨，寫文章談問題，必以孝悌忠信仁義為依歸。這些年來，他歷盡艱難困苦，如孟子說：「天將降大任到這個人身上，就要讓他先嚐受苦難，以堅定其心志，養成不怕勞苦能耐饑寒的體魄。」仲淹在過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歲月裏，從心靈的深處激發出一種精神力量，產生新的意識，感覺到身處和平安定的時代，對國家社會應擔當些許責任，奉獻一己力量，以造福人羣。^①他常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他一生奮鬥的總指標。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考中進士乙科，被派為廣德軍司理參軍，這是一個幕職，責在佐理首長處理刑獄案件。他不以地位低微而謙默，為審理訟案常與長官爭是非論曲直，必使獄得其情而後止。長官常以盛怒對待他，他並不隨便遷就。他把這些爭辯的話記在屏風上，離職的時候，屏風上已無處可寫了。這時他窮得無法生活，把僅剩的一匹馬也賣掉了，如非有相當的素養，如何能有這樣高的情操呢！^②

仲淹在仕途上雖有若干波折，還算是差強人意的。天禧元年上表請復范姓，調集慶軍節度推官。二年，改亳州從事。三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以舉薦監泰州西溪鹽倉。仁宗天聖元年（一〇二二年），以勞績晉大理寺丞，又被保舉知興化縣，三年，改監楚州糧料院，次年丁母憂辭官。他雖然在守喪期間，也「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王曾、張知白請求政府留意「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洋

洋近萬言，完全是憂國憂民的赤誠流露。他提出固邦本的辦法是舉縣令擇郡守，澄清吏治，以救斯民。厚民力的辦法是復游散去冗僭，人人從事生產，以充實家國財富。重名器的辦法是慎選舉敦教育，網羅培植人才，增加新陳代謝。備戎狄的辦法是育將材實邊郡，加強國防守衛，阻止敵人入侵。杜奸雄的辦法是革新政治，使百姓無怨，以絕亂源。明國聽的辦法則在於親近忠直之士而遠斥佞倖。（《范文正公集》卷八《上執政書》）這都是最根本的。

仲淹免喪後，以南京留守晏殊的推薦，召試秘閣校理。天聖七年冬至，上疏諫阻仁宗率文武百官朝賀章獻明肅皇太后上壽，有云：「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純從尊君重統的大法立言。晏殊是推薦他的人，聞之大為恐懼，馬上告誡說：「不要以狂率邀名，這樣會連累我這位推薦人的。」仲淹很鄭重正色的抗辯說：「謬承我公薦舉，常怕不稱職為知己蒙羞，所以才慷慨論事，奮不顧身，不料今日反以忠直獲罪於門下。」殊被說得啞口無言。仁宗十三歲即位，由章獻垂簾權同聽政，處分軍國重事，太后宣諭說：「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到這時帝已二十歲了，不再是青少年，而太后並沒有還政的意思，仲淹又上疏請還政，不報。遂自請外放，有詔出為河中府通判。九年，遷太常博士，移調通判陳州。雖居倖貳之職，仍極關心國家政治利病，遇到應與應革的事情和朝中不正當的舉措，必附驛奏疏直言之，辭甚懇摯。

明道二年，章獻皇太后逝世了，仁宗親政，一反太后垂簾時代的政令。首先外放一批太后任用的大臣，而拔擢不阿附的奇士填補之，四方稱頌，人心大悅。仲淹自陳州召還。除右司諫。仲淹也像唐代的魏徵一樣：「恥君不如堯舜，每以進諫為心。」這年冬，宰相呂夷簡

勸仁宗廢郭后，仲淹諫阻，不聽。乃聯合御史中丞孔道輔、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祁、右正言劉渙等伏闕請求道：皇后不當廢。因此與呂夷簡發生正面衝突，終於遭到放逐，出知睦州。臺諫官又上書申理。將作監丞富弼也上疏營救，皆留中不發。仲淹到睦州任後，所上謝表仍歷陳歷代廢后招禍之事以爲諫，而自己則是「樂道忘憂，含忠履潔，金石不移。」（《范文正公集》卷十五《睦州謝上表》）

仲淹在睦州不到半年，就被調到蘇州。蘇州是他的故鄉，也是稻米產量最豐的地區之一，但以靠近太湖，每年夏天常有水患。乃招募遊手疏浚五條河，導積水入海。水利大興。景祐二年，仁宗以他興修水利之功，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回京師，判國子監。不久，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他一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現在論事更急切，無所避憚。論及建都，則以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仁宗曾以遷都的問題向宰相呂夷簡徵詢意見，夷簡指爲「迂闊，務名無實。」好像不屑一顧似的。仲淹因而又上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臣下。大抵譏諷時政。又獻了一幅百官圖，說明遷進遲速的次序，某人遷某官爲超遷，某人除某官爲左遷，如何做是公，又如何如何做爲私，隱約的批評呂夷簡，以是在仁宗前引起大的爭論，夷簡大怒，指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遂遭罷黜，落職，出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疏辯論說：「刺譏大臣算不得罪過，臣下所言如協聖慮則聽之，否則不聽，怎麼可以加罪呢？」靖被冠以朋黨的罪名，被貶爲監均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心懷不平，也跟着請求從坐，洙說：「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一向義兼師友，朝臣都說臣也是被薦論的，今范某既以朋黨得罪，那麼就與余靖一同

坐罪吧！」洙遂被貶爲監郢州酒稅。歐陽修非常氣憤，與右司諫高若訥書，直指其詆斥仲淹的不當，並言：「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若訥得書大怒，上疏辯論，斥仲淹及修是「這等狂言，自取譴辱。」修因坐貶爲夷陵縣令。西京留守推官蔡襄有感於當時朝臣缺乏正義，以致是非不分，乃寫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余靖、尹洙和歐陽修，一不肖指高若訥，都城人士爭相傳寫，一時洛陽紙貴，就連恰巧來聘的契丹使臣聞之也買了一份帶回國。（王闢之《渢水燕談錄》卷二）

仲淹抵達饒州任所後，謝上表中還坦然地說：「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這正是他的懷抱。他不管擔任什麼公職，都是一本赤誠，認真做事。由饒州改潤州，再徙越州，所在推行惠民利物之政。

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年）冬十月，西夏國主趙元昊僭號稱帝，建國號曰大夏，一反乃父德明的親宋政策，而發動侵略戰爭。宋朝在長期和平之後，士卒的訓練不夠，將領的儲備不足，邊疆防衛相當脆弱，軍需物資亦極貧乏，故言戰毫無勝算，言守則士卒無固志。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略延州，知州事范雍早先爲元昊所愚，未作守備之計，及突然大敵壓境，被迫得手足無措，倉皇間召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來援，二人力戰而死。幸而遇到大雪，夏兵不敢久留，纔算解了延州之圍。這時候陝西的形勢非常危殆，范雍不足以擔當重任，非起用暢曉軍事有幹略的重臣不足以扭轉頹勢。仁宗乃命韓琦安撫陝西，並復仲淹天章閣待制移知永興軍。仲淹還未到永興，又改陝西轉運使，宰相呂夷簡奏言：轉運使不預軍

事，請超遷以寵之。乃改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但他自請知延州。仁宗知道夷簡同仲淹有些不愉快，諭令他們盡釋前嫌，仲淹上前奏道：「臣往日所爭論的無非爲了國事，對夷簡有何憾恨呢！」不失爲光明磊落的胸襟。而且國難當前，爲了國家都應當有郭子儀、李光弼的風範，不念舊怨，通力合作，救亡圖存。夷簡首先表示了寬宏大量，仲淹報以書說：「唐時郭汾陽（子儀）與李臨淮（光弼）素有怨隙，見了面互不講話，等到安祿山作亂，子儀奉命討賊，兩人即化敵爲友，握手泣別，以忠義互勉，終於救平大盜，實兩人戮力同心之功。今相公有郭汾陽之心之言，惜仲淹乏李臨淮之才之力。」（《皇宋文鑑》卷二三）這封信寫得不亢不卑，情理兼顧，是相當感人的。而且把呂夷簡比擬郭子儀，也是極高的推崇，而自己則以李光弼自期，意味著討平西夏的叛亂是指日可待的。果然在夷簡的立意補過和仲淹的推誠相與之下，替國家了了一件大事。所以歐陽修撰《仲淹神道碑》就寫下「歡然相約，戮力破賊」的興奮語，在當日也傳爲美談，這種高風雅量確是後來的政治家所沒有的。

《孫子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仲淹到了延州，面對強敵，曾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他深知人強我弱，人有戰馬，我則城郭不完。像近邊的城寨僅有五六分的防衛，而關中地區之備亦不過二三分而已，如何可以主動的與敵人決戰！所以目前首要的工作是採取堅壁清野的防守策略，在關中充實糧餉和武器，加強各邊城的防衛力量，城與城間構成犄角之勢，使敵進無可乘之隙，退無可掠之物，士氣自然消沉。宋朝軍隊往昔沒有經過戰鬥，所以敵人來了就驚慌畏怯，故當先固守以加強心理防線，以求慢慢適應。將來且訓且守且戰，軍隊越磨練越壯大。這種持久戰消耗戰的戰略是針對西夏速戰速決戰略擬定的。當時韓琦不

以爲然，認爲戰爭勝敗乃兵家常事，大將用兵尤應置勝負於度外。因主張深入敵國，大張撻伐，苟能恢拓區宇，也好安固後世，振大漢的天聲。豈料在慶曆元年發動的一次春季攻勢中，於好水川之役，竟遭遇西夏埋伏，而全軍覆沒，使宋軍喪失不少元氣。此後，宋軍再也不敢主動攻擊了。那麼亡羊補牢的辦法便是韓琦和仲淹同心協謀，嚴守邊疆，選擇險要的地方築城，修復廢寨，大開屯田，聯絡屬羌，練兵積穀，增強戰力，培養鬥志，敵來則與之戰，敵退也不深追，穩紮穩打，積小勝爲大勝，三年後，遂使西方藩籬固若金湯。邊上百姓爲之謠歌以紀其實，說：「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以宋朝的人員物資和不斷更新的攻守武器，實具有充沛的潛力。西夏民貧國乏，靠打仗掠奪以助國用而裕民生，如果戰爭對他們不能帶來好處，反而不如通和稱臣可以年年得賞賜爲愈了。這就是慶曆四年元昊上表稱臣接受宋朝封號的重要因素。試想如無仲淹坐鎮西陲，支撐危局，設若關中不守，河南、河東震驚，契丹必在河北藉故生釁，如是兩面受敵，恐怕不必待「靖康之難」，宋室早已南渡了！這一假設是有相當的理由根據的。

宋朝在遼和西夏兩強的欺凌下如何自處？想來別無他道，只有變法圖強，這是當時仁宗最敏捷的反應。慶曆三年，仲淹自樞密副使進拜參知政事，仁宗求治心切，常責以致太平，乃開天章閣訪以時政得失，賜紙筆，使條述應興應革的事項，仲淹退而與韓琦、富弼聯合草擬萬言書奏上，提出十項綱領，作爲革新的指標，都是最急切而關係國家生存發展的。他們共同體認當時「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能坐視不救，再不革新就可能動搖國本了。這十項綱領是：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

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仁宗都開懷聽納，當著於令者，皆使畫一次第頒下。不過由於因循日久，積重難返，而裁抑僥倖，均定公田，尤損害到某些官吏的既得利益，所以反對的浪潮很洶湧；而且更張的範圍太廣，規模太大，缺乏次第，論者以為難行，交相批評，終使仲淹和富弼不安於位。慶曆四年六月，仲淹出為陝西路宣撫使，不久，富弼出使河北，這項革新運動無形中停頓了！

宋朝是文人政治，士大夫最喜歡批評人事，蜚短流長，煞有介事。其最終目的是貶抑與自己意見相反的人，指為小人；而標榜自己和一切與自己意見一致的同道，稱做君子。很自然的就形成對立，黨派的分界越鮮明，則敵對的態勢越嚴重。夏竦罷樞密使後，杜衍、韓琦、富弼和仲淹同在二府，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並為諫官，石介說：這是盛德之事，不可以不用詩歌加以頌揚。乃作〈慶曆盛德頌〉四言古詩一首，有云：「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既直指夏竦為大奸，當然是會得罪人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三十七〈夏竦事蹟〉）。於是朋黨之論遂一發而不可休止。仁宗日聞讒言，聽得多了，對仲淹的信心難免產生動搖，慶曆五年正月罷任，知鄆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於是磨勘法和保任法相繼遭到監察御史劉元瑜的批評而被廢止了。

仲淹主持「慶曆革新」，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峯，再使陝西以後，便沒有重回到京都來。猜忌怨恨的朝中新貴，如夏竦等人，正無中生有的攻擊富弼和仲淹，最狠毒的手法便是告發不忠，竟說握兵在外，將有異謀。乃分別奪其撫邊的兵權，改治內郡，仲淹得知鄆州。慶曆八年（一〇四八年），徙知荆南府，鄆州百姓遮道請留，乃上表請求仍舊留治。次年正月，

以資政殿大學士加給事中，移知杭州，七月，加尚書禮部侍郎，皇祐二年冬，加戶部侍郎，徙知青州，兼京都路安撫使。所至推行惠民的仁政，父老感德，皆立生祠以祀之。四年春，以疾請求改知潁州，五月二十日行至徐州，病加劇，遂卒，年六十四。仲淹生於徐州，卒於徐州，也是很巧合的了。

① 錢穆《國史大綱》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第一節〈學術思想的新曙光〉中指出：「范仲淹並不是一個貴族，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裏自己讀書，在斷齋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爲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爲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自注云：「此即是范仲淹之偉大處。」當時講學家如胡瑗等同樣地在心靈的深處有一種新的覺醒，苦學成名後即以其所自得的轉以教人，其精神意境可以說師法孔子。

② 趙善瑋的《自警篇》記載范仲淹年少時曾到廟裏許下兩個願：(1)爲相願爲良相。若不能如願以償，則退而求其次。(2)習醫願爲良醫。良相治國除弊興利，爲全國人民謀幸福。良醫精於病理，對症下藥，立刻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且不以賺錢爲目的，對貧困病家更有惠。仲淹以新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初入仕途表現即不凡，汪藻《浮溪集》卷十八《范文正公祠堂記》中言之甚詳。

二、思想

仲淹以窮秀才起家，致位宰輔，是完全憑藉個人的才能學識和品德循序上進，終至贏得朝廷重任的，毫無背景可依，亦無僥倖可言，故在宋朝的政治環境裏，這本是很正常的。宋代是用儒術治國的時代，以仁厚為政治的最高指標，傳統的儒家思想，在整個社會裏都散播著存留著，對每位受這種思想陶鑄的士大夫，無時不在或多或少的影響著。仲淹自幼苦讀五經，在醴泉寺和應天書院中，專心研究，而有一些新的體認。當時宋朝的官學並不普及，尚沒有人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①仲淹是過來人，面對著新生的下一代青少年，有義務替他們安排一個讀書的好環境，使他們真正的享受到受教育的均等權利。他認為學校是作育人才的地方，青襟學子尤當勤學乃能期望陶鑄成為人才；所以政府必先設學校以勸學，然後方能培養出治國平天下的人才。因而他提出宗經勸學的主張，蓋經中存著聖賢相傳的道，重視經，以經中所述的大道至理薰陶學子，其所獲越多，其才就越大；才越大，其能成就的事功也越大。《書經》中記載了先聖創法立制的言論，可以回觀聖人之心。《易經》中隱含著安危治亂的微妙至理，值得深思熟慮。《詩經》中指示一些可以鑑戒的政治得失，發人深省。《春秋》中記載了一些破家亡國的歷史，對亂臣賊子的口誅筆伐，正可以加強一個人邪正是非的觀念。

《禮經》中規定著萬物之靈的人類所應守的大節細目，先聖制禮的精神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人之所以爲人而能立於天地之間者在此，否則便與禽獸幾稀了。《樂經》雖不存在，但中庸和平的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淳美情操，移風易俗，順乎自然，使萬物各得其情。仲淹的意思是：藉著對六經的精深研究，透悉聖人「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的心境，然後以聖賢之心爲心，小則個人立身處世之所本，大則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無不想達其極致，庶幾近乎王道。這是他的教育思想，完全是儒家的。

仲淹要實現他的教育理想，在慶曆四年就任參知政事後所條陳的十項改革方案中，第三項精貢舉，就痛陳科舉以辭賦取進士的弊病，無異捨大而趨小，忘本而務末，雖然每屆大比錄取兩三百名進士，但想求有才有識的，則十不十一。所以他請求在各路州縣普遍設立學校，推薦通經有道的碩學宏儒專任教授，教以經世濟民之業，平日注意品行的考察，一旦入仕，國家擇人任使，不致毫無所知。方向既明，青年學子便知所勸勉了。^②

仲淹不單純是教育理論家，而且是實行家，他蒞官所至，無不留心興學校，薦人才。如在天聖元年知興化縣時就創建縣學，五年丁母憂寓居應天府（宋州）城下，又受南京留守晏殊之託，出掌府學內之事。他晚上留宿在齋舍中，與學生生活在一起，他不專重言教，而尤以身作則，在短短兩年多中，學風爲之大變，後來宋州地區人士在政界學術界有名的，多半是他教誨過的。

在政治上，仲淹思想是急進的，他反對守故蹈常的積習，而主張制度要隨時代的演進作合理的改革，以求順應時代潮流。要想改革政治積弊，當然須先儲備和造就人才，盡爲國家